



# 义乌文史资料

## 第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
浙江省义乌市委员会  
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
一九九三年十二月

# 目 录

义乌商会史	(1)
记朱献文先生	(6)
金祖孟先生传略	(12)
从事航空教育五十周年的季文美教授	
饮誉欧美的女钢琴家陈必先	(29)
吴椿(山民)任定海县长始末	(32)
抗战中的义乌县政府应变工作纪要	(36)
义乌旅金同乡会的沧桑	(85)
纪念朱成学	(90)
叛徒的下场	(98)

# 义乌商会史(1906——1949)

朱新海 王茂松

追溯商会的雏形组织，始于清光绪维新变革之后。正式商会成立伊始，因当时县府无工商、金融、物价等掌握机构，故商会拥有某些职能，会长就有某些裁夺之权。在当时甚至接过衙门的值勤守更，特别是冬防期间，还要协助衙门负责治安，税务方面也以商会为辅佐机构。

## 一、商会的诞生

义乌地处浙江中部，东阳江过义乌经兰溪入钱塘江，早有航船直达杭州，其后又有浙赣铁路横贯义乌而过，交通更方便，地理环境更优越。于是安徽、福建、绍兴等外地客商纷纷迁来义乌定居经商。19世纪90年代，沪、杭等地首先出现了代表商界利益的商会，义乌商会也应运而生。其初称商会分会，属雏形筹备阶段。于1916年成为正式商会，名曰“义乌县商会”。会址设在县前街台门傅（今市政府第一招待所地段），祠内中堂上书“励精图治”四字。嗣因会务扩大，集资在大安寺塔旁，原大安寺地址，兴建楼屋9间，有会议大厅和办公室等设置（文革期间被拆建为文化馆）。接着佛堂镇也建立了商会。商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，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兴旺。

## 二、商会长的更替

1916年义乌县商会成立，首任会长楼虎臣（名炳文）。楼16岁中秀才，候补儒学训导，在金华中学任教多年，清末民初任劝学所所长7年。小康之家，不经商，为人公正，乐于为群众排难解纷，德高望重，商民爱戴，公推为首任商会会长。北伐时期，有一次军阀孙传芳部队溃兵经过义乌，时近年关，溃兵要挟县知事王继美筹饷，扬言如不满足，即洗劫稠城。商民惊恐万分，县知事邀楼会长协同处理，楼慨然应允。除夕之夜，又有部分溃兵过境，涌至商会，且鸣枪威胁，众人皆远避，惟楼会长泰然自若，沉着处理，溃兵自退，稠城才免除一场灾难。楼连选连任计12年。1928年知名人士陈槐之子陈乃薰接任，陈家开设陈平顺酱坊，所产“三伏酱油”顶油，曾获得西湖博览会奖。陈在任6年，任内完成了义东公路等事业。1934年由胡纯道（性甫）接任，胡开设胡义扬酱园店，任期5年，任内筹资建设商会新址等公益事业。1939年秋由童子联（名必辉）接收，童系清末科秀才入省武备学堂四期正则科，参加秋瑾领导的光复会，毕业后民国三年（1914）任浙军九十八团团副，最后任兰溪团管区司令。后脱离军队还乡，致力于兴办实业，主持南华公司，合资办义乌电气公司。抗战时期还安装电笛传布空袭警报，1942年义乌沦陷，电厂被毁，日军因其资望，胁迫出任维持会长遭拒绝，避居塔山乡石门坑，不慎跌伤而罹破伤风，不治逝世，会务停顿。抗战胜利后，县府指令恢复商会，令龚琛、季敬铭、胡纯道、王惠荣、梅永武、方炳荣、杨河清等7人为商会整理员。1945年11月30日召开整理员第二次会议，公推季敬铭为主主任成立办事处。1946年1月3日召开整理员第五次会议，决议在同月21日召开会员代表大会，届时出席代表

46人，公推季敬铭、胡纯道等9人为理事，赵一安等3人为监事。23日召开理、监事会议，产生常务理事5人，以季敬铭为理事长（即会长）。季开设季万新锅、什、粮店、殷户。不久，季辞去理事长。1946年3月1日龚琛接任理事长。龚开设龚聚沆酱油坊，资金雄厚，酒、酱、腌三缸并重，兼营瑞丰钱庄。1938年1月27日改选常务理事，季敬铭再次当选为理事长，并兼稠城镇长职到解放为止。

### 三、同业公会的建立和作用

商会工作必须建立在同业公会基础上。各商号为谋求本身利益，有必要加入同业公会的组织，乐意接受商会的领导，所以商会的产生，促进了同业公会的发展。义乌自1916年商会诞生后，先后建立烟业、粮食、酒酱、肉业（包括腌腊）、医药、棉布、南货、京百货、文具、五金（包括铁业）、成衣（包括估衣）、什货、银钱（银楼、钱庄、典当）、竹木、鞋业、运输、经纪、饮食服务（包括旅馆、照相）等18个同业公会。但有时或合并或分开，其组织有所变动。其主要活动：（1）商品批零价格和服务性行业的收费标准，均须同行公议，遵守议定价格，各商户无权更动，并挂上“同行公议”牌于门首，有的商户还写上“货真价实、童叟无欺”字牌，以昭信誉。如被顾客发现确有弄虚作假行为者，要受同行组织上议处。（2）调解和仲裁同业间争执和纠纷。（3）缴交商会会费或商会会议下的地方公益事业经费的筹措。（4）相互通报外埠经营信息，研讨办事。有的同业约期聚餐，联络感情，消除同业嫉妒观念。（5）承担商会秉承县府交办事宜。

### 四、商会兴办的社会事业

1、举办贫民习艺所 民国八年（1919），在商会会长引导下，邀集楼、陈、朱、黄等姓著名士绅在稠城镇举办贫民习艺

所。商定诸姓城内桑林园地和城郊山林丘地约三百余亩的收益，充办习艺所经费。初设在湖清门姓李祠堂内，后移至高堪头的黄大宗祠。该习艺所设有：木匠、泥水、篾匠、雕刻、染色、纺织、缝纫等料，凡贫民均可进所学艺。第一任所长何仁甫，廿三里镇何宅人，毕业于日本实业学校。第二任所长胡理耕，稠城人，毕业于日本工艺学院，善图案，精设计，以胡任为最盛期。先后更易 5 人，最后被楼景卿败落而停办。据当时曾在该所学艺现尚健在的人说：“习艺所停办太可惜。”

2、修筑义东公路 1932 年，商会会长陈乃薰与东阳磋商决定建筑义东公路，派公股和私股代表同省建设厅签订路程合同。义(乌)东(阳)公路全长 18.25 公里，于 1933 年 11 月 12 日竣工。义东公路筹建时，先成立义东汽车股份有限公司，共集资 11 万元，其中公股 7 万元，由义、东两县政府田赋中带征，私股 4 万元，由两县商会筹集，义乌 120 人认 564 股，共股金 2.82 万元。竣工后，公司即备汽车经营客、货运输业务，群众称便。

同时又集资兴建稠城北门口至火车站段人力车通道，路宽 2.5 米，由新华车行承租运行人力车(黄包车)。1940 年扩建为公路，于同年 4 月竣工通车。

3、两次创办电厂 商会童子联等发起筹股创办义乌发电厂，每股大洋 60 元，共发行股票 120 股，共 7200 元。购进大飞轮 60 匹马力柴油机一台，发电机二只。白天碾米磨粉，晚上照明，其设备虽简陋但已初步改变了以菜油、煤油点灯的陈旧面貌。不幸于 1942 年日寇入侵时遭炸毁，被拆走。解放后，在人民政府领导下，工商联重新筹办光明电厂，恢复发电，使稠城重放光明。

4、建成商会大楼 胡纯道会长任内，深感商会旧址台门傅场所狭窄，较大会议，就无法召开，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形势的需要，亟需另建较为宽敞的会房。选定大安寺塔傍基地之后，又为筹措资金而煞费苦心。为求减轻商民负担，决定去嵊县聘请群芳舞台（女子班）来义演戏募款，演了5天，募款800元，本来800元还不敷建房之用，尚要续演，奈戏班主似开玩笑地说：“依拉义乌人，要吃豆腐，阿拉勿来做哉”。过后商会会长探明情由，原来地方上有个别流氓式的人去戏班与女演员调情说笑，态度轻佻，宁波腔话叫做“吃豆腐”。确实有伤文明，不强续演。只得就以800元之款，建造了楼房9间，为商会办公、开会之用，不足之数，由商会另筹填补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已近半个世纪，当年商界人物，绝大部分已驾鹤西去。对于义乌商会史，虽经多方查询，所叙仍欠全面，不过述其概貌而已。

## 记朱献文先生

阮毅成

1931年1月，我自欧洲回国，住在南京黄泥冈鼓楼饭店，当时应司法行政部法官训练之聘，担任教课，同时又担任国立中央大学的教课。

住在鼓楼饭店的旅客，大多数是各机关公务员，也大多数是单身，皆长期居住，按月付租。时间稍长，每日进的人，便都自然而然地相互熟悉了。我当时见到一位长者，布衣素履，须发灰白，仪容整齐，举止安详，说话是金华一带土音，旅客中的住客都对这位老者带有几分尊敬。我问茶房，这位房客是谁？他说：“只知道他姓朱，是一位法官。”过了几天，茶房对我说：“你上次问起的朱法官，他也问我你是谁。他看见你每晚都在屋内用功，说是很难得。我已经把你姓名对他说了，他说那一定是他朋友的儿子，他明天晚上下班后要来看你”。

我应该说明，其时我是27岁，这位朱法官是民国前四十年生，算来已是60岁（这是我后来知晓的）。我认为他比我长得很多，尤其提到我父亲，应是我长辈，于是第二天一早，我特提前起床，赶在他出门之前先去拜访。见面之后，才知他就是朱郁堂（献文）先生。

我年轻时，就听到过郁堂先生大名，他是清末丁酉科拔贡，与父亲同在日本习法政，在京都帝国大学法科毕业。先后任大理院推事，江西、京都、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。民初规定法官要回避本省，所以他未在浙江担任过职务。我之知道这些，并非是父亲过去提起过，而大多由于沈复生（锡庆）先生口述。沈是绍兴人，是父亲的高足。在上海任地方审判厅厅长多年。北洋军阀盘踞浙江期间，父亲策动夏超独立，事败，夏被孙传芳部下孙梅村擒获处死，父亲避难上海租界，沈则常来看望老师，谈话时，就常谈到郁堂先生，因为沈做过江苏高等审判厅推事、庭长，郁老是他直属长官。沈对于郁老的治事之明，律己之严，待人之厚，爱民之深，真是倾倒之至，并列举出许多事实，以为佐证。因而，我虽则迄未见到郁堂先生，却真是心仪已久。

郁堂先生因为在司法院任事，因此住在鼓楼饭店，因两处都在城北。自此，我就常去朱老房内访谈。他很留心欧洲的法学新思潮。他说：“国民政府成立尚不久，一切法典均尚未着手编订，必须参考欧战以后的各国立法新趋势，才可以适应当前需要。”他每次都问得很多，很详细，而且非常专心听我介绍。他要看我所写的讲义与所改的考卷。对我指导很多，受益不浅。

其后，我家眷自杭州来京，就迁出鼓楼饭店，但仍常去访谒郁老，每次也还是谈的很多。

1937年7月，抗战军兴，政府迁都重庆，郁老以年事已高乃辞职回义乌佛堂雅治街原籍。佛堂距义乌县城卅华里，可避空袭。郁老中年以后，即一心念佛，长年茹素，因而身体健康，心情安适。我曾请教学佛之道，他说：“先要万念归于一念，而

再一念归于无念。”1939年春，浙江省筹设临时省参议会（简称临参会），规定议员名额40人，我提出请郁老出任省参议员，经核定后，我才去面请。他以共赴国难为重，遂到永康参加会议工作。战时因防空袭警报，临参会设在距城外十里之下园朱，郁老每次来回，都是步行。自此，他常往来于永康金华义乌之间，凡有见闻，必对我直言无隐（其时本文作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，在永康县方岩办公）。

1939年11月6日，第一届临参会举行二次大会，我报告民政工作以后，郁老即在会上提出请妥筹保长办公费以奠定自治基础案。案文为：

“查地方自治，以保甲为基础，必保甲制度规划妥善，自治基础方臻稳固。而甲隶于保，甲长系办全保（甲）事务。言保，而甲即寓其中。抗战期内，各县办理兵役与派募抗卫捐等要政，均由乡镇层转保长办理，保长居实际推行之地位。即管教养卫，将来如欲次第举行，亦有赖于各保长之推动。保长职责，既如此之重，而任劳任怨，又无薪给，若办公费再令其赔垫，殊失情理之平。上次会议，闻民政厅长报告，亦有每保办公弗及事费筹足每月四元之议，迄未实施，想系款未筹妥之故。本省自39年度起，依照田赋及普通营业税之标准，加征自治经费二成，计其岁入，分给全省二千四百余乡镇额定办公经费，尚觉不足，保长办公费恐难再向此分润。综计全省保之为数有三万二千八百二十之多，必须另筹的款发给。拟请省府令民财二厅，先行会同审酌，按保长办理事务之繁简轻重，酌定每月必需之办公费，可否即由各县官契

卖价与屠宰税两项收入，拨成发给……”

郁老这一提案，为省临时参议会中对于健全地方自治充实基层力量的唯一提案。该案通过后，送达省府，由民财两厅会商筹集保办公处经费办法，付之执行。其次，中央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，要他省以自治经费无着，发生困难，而浙江省独能在战时战地，全面实施，深入敌后，远及边区，郁老这一提议，是有其很大的贡献的。

1940年5月6日，浙江省长一届省临时参议会，举行第三次大会，在开幕典礼时，郁老代表全体议员致词，其要点：

(一)省政府与本会……图谋福利全省民众之目的，则彼此同。目的既同，彼此即应互相体谅，互相敬重，咸 风雨同舟之谊，和衷共济，不可掺杂丝毫意见。

(二)语及省政，……当熟及缓急先后，倘与抗战胜利无关，似可列为缓图。

(三)行政机关多设，非但糜费，即公事之辗转周折，亦易滋分歧与延缓之弊，政府应统筹计划，重新调整一次，应裁撤则撤，应并则并。

(四)……凡属忠勤廉洁之公务员，诚宜曲加爱护，若属贪污，即应秉纠察，依法严绳。

(五)抗战结束，想为期尚远，浙省岁出，已增至四千数百万，本年闻续有增加……望省府，当用则用，可省则省，念财力艰窘，来日不难。使效果与经费臻于平衡，毋愧对提赋税之浙民。

向例，议会开幕闭幕，致词者都是一番客套语，而郁老的这段话义正词严，使当时在座的人，无一不为之动容，其直声遍于全浙。

1942年5月，敌人进犯浙赣路，永康金华义乌等地均于倾刻陷于敌手。郁老暂避缙云县壶镇赵佳修先生处。11月15日，临参会在临时省会云和恢复临时集会，时已71高龄的郁老，仍翻山越岭，历尽艰辛，赶到云和出席。1943年，议长陈屺怀病故，议长一席由郁老继任，副议事仍由余绍荣先生担任，余有诗一首赠朱，诗为：

何期垂暮得追随，共此岩光照乱离。  
劫里重逢难尽意，老来欢聚反增悲。  
苟全但冀能常住，宋道还须善护持。  
色相未空仍健倔，相看毋负岁寒姿。

1944的12月5日，临参会二届三次大会在云和举行，郁老以议长身份致词：“本席今年七十有三，本可在家安逸，惟念国势临危为此，激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，一息尚存此志为容稍懈之大义，勉策衰庸，来以与诸同仁共与会务。”事实上郁老其时虽已高龄，而事必躬亲，一丝不苟，与我父亲在日相同。其对于省政府，也真做到诤友的地位，府会关系不但未因此受到影响，反而双方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更趋于良好。

郁老在抗战期中，常有信给我，兹录他于1940年12月15日一封手书：

“台端近日所讲，于执行政令之中，仍须常存爱护民众之意。法令规定固如是，亦应于可能范围内，研究改进，使手续化繁为简，便利推行，此见极是，执事政论，已由高明过于切实矣。民心对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好恶向背，其机括半操于最下层与人民接近之人员。临之于傲态戾气，则民生厌，若出之以和气谦态，则民亲附。敬、爱、和、谦、信、伦六字，是下层公务

员吸引人民信仰之磁石，台端如谓不谬，在训练或接见此种公务员时，望提及之。”

抗战胜利，各省参议会不再冠以临时二字，省议员由各县参议会选出，郁堂先生认为战事业已结束，共赴国难之任务已达，正式议会成立，浙江民主政治将更见发扬，本人现已七十四岁，自当退休，以期年轻有识之士，得以进入议会，而为地方效力，我虽力劝再任省参议员一届（二年）郁老坚谢未允。

1946年9月，1948年2月我两晤郁老，他力斥高等法院院长夏勤公私德均差，能力薄弱，积案达五万余件，原浙江高等法院院长现调任苏之郑文礼利用职权谋私，可见其关心吏治迫切之情。

1949年，朱先生在金华逝世，享年七十有八。

郁老平生一无嗜好，但曾对我说过：“平时只爱收藏古墨，俸给所余，咸用以赠墨。曾自刊一小石章曰：‘贪墨吏’。所藏之墨在战时均置于佛堂老家，敌人占领时，曾略有损失。郁老也曾屡次约我到义乌去鉴赏他的收藏，而我则迄因公忙，未能践约，这也是一件永远难补偿的憾事。

于 1970 年 6 月 17 日

**阮毅成简介：**阮毅成浙江余姚人，留学法国获法国国家硕士学位，曾任中央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教授、法律系主任，战时任浙江民政厅长达 10 年。1949 年初去台，历任中央日报社社长，东方杂志主编等职，1988 年 8 月病逝台北。

# 金祖孟先生传略

王联光

金祖孟先生，我市青口乡下朱人。出身贫寒农家。小学毕业后，无力升学，进宗宅娘舅家中药店当学徒。历二年，亲友惜其秉赋独秀，勤奋有恒，乃力促升学。兄嫂变卖嫁奁首饰，倾资相助，始得考入省立金华中学。

先生在校刻苦读书，成绩优异。初中毕业，恩师詹调元解囊资助，得以升入高中。二年级时被推为学生自治会主席。任内开展各项课外活动，颇为活跃；办夜校，普及民众文化，深获好评。既毕业，值该校新设“徐东藩奖学金”，先生以考试成绩特优获第一期一项奖学金。借此进中央大学地理系，时1937年。

先生学生时代，除学业特优外，更以勤俭驰誉乡邻。假期返里，辄随兄下田耕作，争做重活脏活，不亚当地农民。1958年，先生已是全国知名学者，全家回乡探亲，到家次日，即率子女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，干劲不减当年，不失农家子弟本色。乡邻感叹，一时传为佳话。先生一生自奉俭约，分文是惜。中学时代，为省车资，不乘火车，行程60公里，假期徒步往返。终其一生，衣食崇简，不求享受；热心公益，乐于助人。大半收入，

不用于支援公益事业，即资助贫困亲友。凡爱国之举，则更不甘后人。抗战军兴，“中大”迁渝。因物价腾飞，货币贬值，生活日见拮据。学校乃设伙食贷金，以解学生之困。富家子弟，纷起申请。而先生则不愿为。并自甘艰苦，月省 2 元，献作抗战经费，以表爱国寸心。抗美援朝中，以稿酬 100 万元（当时人民币值）捐献飞机大炮。1954 年，又从仅有之 1100 元存款中提出 900 元认购公债。爱国之心，拳拳可鉴。其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，始终如一，事不胜书。

先生秉性刚直，守正不阿；光明磊落，待人以诚。其有关地名学论文相继发表后，引起学界重视。先辈张其昀，时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，彼此曾通信探讨。1947 年夏，先生由南京回义乌探亲，途经杭州，出于师谊，乃造访张先生。大陆解放之初，张曾任台湾行政院长，成为国民党显要。因此一段学术切磋，1955 年肃反中竟成政治问题。1940 年，“中大”在重庆时，因物价飞涨，先生所获 4 年“东藩奖学金”，3 年告罄，乃不得已申请伙食贷金。10 月间，贷金未发，而经济来源已断。在此间隙，逼于生存，经同学介绍，进当时为训练东南亚归侨青年从事抗战工作之“海外训练班”，任文书抄写约 1 个月。原为临时应急，以劳动换取一日三餐之举，既无政治目的，更无政治活动。此事时短事小，早已为人所忘。先生出于诚实，听党号召，在运动中主动书面交待上述情节，说清问题原委，不意主事者不察。然坦白竟被无限上纲，虔诚反招飞来横祸。以致身系囹圄，妻以身殉，历 8 月始获释。问题则悬而不决，含冤负屈历 20 余年。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，有关组织至是承认当年错误，给予彻底纠正。在此 20 年间，先生备受不公正待遇，负政治包袱，忍丧妻之痛，仍置个人恩怨于度外。坚信共

产党，热爱社会主义。视学术如生命，以事业为支柱。数十年如一日，孜孜不倦，矢志不渝。心系教学，志在报国。所幸是非当由众议，公道自在人心。学界师友，乡里亲故，旧雨新知，多能洞察真情，尊敬如初。其学术成就，依然广获海外学术界公认，得到充分肯定。

先生一生弥足珍贵者，为学术上之突出成就。初，从事地名学探索。其大学毕业论文《中国政区命名之分类研究》，在《地理学报》发表，即引起地理学界重视。继又写成《地名通论》，把地名问题归纳为四，即结构、含义、分类与结群。其后又在《地名学概说》一文中，将地名学分为训诂地名学、读写地名学、通论地名学三分支。地名学理论体系至此完备。后又在个别分支局部深入，发表《新疆地名与新疆地理》、《地名转译问题》等文，成为地名学最早开拓者。其一系列论文，时隔 50 年，精辟创见，仍为学术界奉为主臬，堪称不朽之作。

自 1945 年始，先生在“中大”从事自然地理学教学。上课前，即写出教材《数学地理》。1953 年，此书由中华书局出版，不少学子受此书启迪，从而与地理科学结下不解之缘。错案纠正后，先生以其固有之热情与干劲，轻装上阵。虽年事渐高，但精神焕发，壮志未已，一崭新之时期由此开始。从事研究与教学，创立《地球概论》课程。其所编著之《地球概论》一书，初版于 1978 年，再版于 1983 年，迄今印数累计已达 17 万册，并获 1988 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。1990 年，台湾五南图书公司购得本书版权，于 1992 年出版，并已在港台及南洋广为发行。惜先生病中仅知有此项计划，但未能目睹实现，实为憾事。

先生主持从事《地球概论》课程建设，不仅写一教材而已，更以“搞课程配套建设，为全国高师服务”为宗旨，从大纲、